

秦汉时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 及其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和迁徙特点

古永继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秦汉数百年间, 西南地区步入自身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外来移民在边疆开发、疆域形成以及当地局势变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以相关史料为依据, 对此时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 及其在促使当地人口增长、支持郡县设置、引进先进技术、传播封建文化、形成大姓势力和有关迁徙特点等方面, 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秦汉 西南 移民 边疆开发 特点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西南疆域, 初步形成于秦汉时期。地处西南边陲而战略地位不凡的川西南及滇黔地区, 其治乱兴衰与内地安危及国家疆域稳定密切相关, 而民族众多、地广人稀、交通艰险、条件落后又形成与内地不同的特点, 因而中原向西南地区移民始终是历代封建王朝边疆治理中的相关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全国, 秦汉时西南地区的移民并不突出; 但就其自身而言, 此时期的外来移民对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却影响深远。分析和研究秦汉时西南地区的移民及其在边疆开发、疆域形成、当地局势变化中的作用和有关迁徙特点, 探讨外来移民与古代边疆治理的关系及其规律, 对了解历史上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其人口问题, 促进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和建设西南边疆, 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一

所谓移民, 是指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¹移民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 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 它既有因灾害、战争等突发事变而引起的自发性流移, 也有在国家干预下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目的而安排进行的计划性迁徙; 既有数量众多、性质单一的群体性迁移, 也有零星显现、层次复杂、形式多样的个体性移居。

早在战国时期, 西南北部的巴蜀一带即有统治者的迁民之举。公元前 314 年, 秦惠文王灭蜀国后于其地置巴郡, “以张若为蜀国守……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秦始皇统一天下, 作

¹按: 对于移民, 人们历来注意的往往只是外地进入某一地区的落籍定居者。其实, 落籍定居固一目了然, 但他们只是移民中的一部分, 即显性移民; 寄籍者中也有相当部分属移民之列, 可称隐性移民。大量寄籍于当地的军政吏卒, 他们虽多在某一岗位数年后即调离或轮换, 但位置常设, 你去他来, 流动周转, 居于此岗位者自然也构成当时本地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各级机构中的主要官员, 他们承担着中央王朝赋予的治理当地的使命, 行使着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力, 其在任期内的施政作为、言行举止、兴趣爱好等, 无不对当地社会影响巨大。对这种特殊身份的隐性移民, 应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定位和评价。见葛剑雄主编: 《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第 10 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为秦朝西南边域的巴蜀，由于与中原之间交通阻隔，来往不便，更成为统治者安置罪人的理想之地。《史记·项羽本纪》说：“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大量六国贵族、富豪、商贾及罪人家属被强行迁徙至蜀，著名者如迁至临邛（今四川邛崃）以冶铁致富的赵人卓王孙、程郑氏及迁蜀的丞相吕不韦、长信侯嫪毐之宗族宾客等。而处于当时边外的西南夷地区分布有邛都、笮、犍、夜郎、滇、同师、叶榆、昆明等诸多部落族群的今川西南及滇黔一带，随着秦对全国的统一，其势力也不断深入。“秦时常頡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2]秦自今四川宜宾经贵州西北部到云南曲靖之间，修筑了连接邛都、夜郎和滇国等地的交通路线五尺道，将其逐步纳入大一统的范围。此虽无移民的专门记载，但开通道路、设置衙门、派驻官吏，有关人员需从外地进入；尽管这些机构随着秦的灭亡而撤消，而从汉初这些地区与巴蜀仍暗通商路来看，应有部分人员留居当地。

云南地区，在此前已有中原移民进入。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地，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3]此时的楚人定居西南成为移民且入乡随俗，只是一种形势变化后的被迫和无奈选择，并非事先有计划的主动行为。

西汉王朝建立，人口迁徙成为封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如汉高祖刘邦迁徙关东豪强十余万口于关中，汉文帝、汉景帝“募民徙塞下”以御匈奴、“募民徙阳陵”以卫皇陵等。^[4]此时统治者边疆经略的重点在于西北和北方，对西南地区尚无暇顾及而一度放弃，故对该地可见“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5]“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之类记载。汉武帝时，随着国力的强盛，在向西北、关中地区大量徙民、迁豪及通西域的同时，配合抵御匈奴、征讨南越的战略需要和拓土开疆政策的推行，重新开始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因而汉代往西南地区的移民，也以此时期最为突出。

两汉时，人们把今川西南、云贵及甘南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概称为西南夷，其中又把地处川西、川西南及滇西的邛、笮、犍、昆明等称为西夷，把川南云贵境内的滇、夜郎、且兰等称为南夷。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相继开凿了三条通道：建元时（公元前140～前135）唐蒙奉命“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自僊道指牂柯江”，^[5]“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今云南曲靖）二千余里”，^[6]通其道以开制南越奇路，于夜郎地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西南），自今四川宜宾修建经贵州入北盘江水路达广州的通道，称南夷道或夜郎道，并于沿途设置邮亭^[2]；继而司马相如略定西夷，在邛、笮等地设一都尉、十余县而隶属蜀郡，并“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5]在今川西南成都至西昌一带新辟西夷道，又称零关道、灵水道；后又“通博南山，度兰沧水、濬溪，置犍唐、不韦二县”，联通今滇西永平、保山和施甸一带，称博南道或永昌道。^[7]开西南夷道工程艰巨，征发巴蜀大量民夫，历经数年，人员物资耗费巨大并激起当地民族多次反抗，其间一度停罢经营西夷而专事匈奴。三条通道，沟通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成为当时中原和巴蜀人民进入滇黔地区的重要路线；而当中的部分修路民夫，也无疑成为了外地移民的重要来源之一。

元狩六年（前122年），汉武帝听张骞介绍出使大夏见闻后，为从西南寻求通往大夏近道而始通滇国，此后并陆续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益州（治今云南晋宁东北）、越巂（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牂柯（治今贵州凯里西北）等郡，加上已有的犍为及东汉时于滇西所设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滇东北所设朱提（治今云南昭通）二郡，基本上覆盖了今川西南及云南、贵州的大部地区。上述各郡均领有属县若干，按汉制要求，其太守、县令及郡县属官一般由中央从内地委派。如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平南越，^[8]其间乘胜诛杀不听号令的且兰、邛君等，“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一度自大的滇王，在重兵压境之下也不得不“举国降，请置吏入朝”；^[9]东汉安帝时益州从事杨

竦一次就“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3]等等。可见外籍官员人数之多。在各地设置郡县同时，必须配备相应的军事力量以作保障，从而又伴随产生了一批长期驻守的“郡兵”。如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 83 年），“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9]败死的四千多郡兵当为益州之兵，而此前已有益州太守被杀一战，说明当时的郡兵数量相当可观。在统治者对西南夷的用兵中，一旦郡兵扑灭不了当地民族反抗的火焰时，即往往从内地征调大军进入，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如西汉末王莽将居于今云南广南一带的句町王贬为侯并加以打击，“三边蛮夷愁扰尽反”，朝廷多次镇压无果，最后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9]二十多万将士，死亡之外不乏战中被俘或战后离散流落者。另在官府与当地民族的正常交往中，也不时出现使者逃亡或被掠卖不返的事件发生。如汉武帝时就有巴蜀人“今奉兵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现象；^[5]东汉时成都人禽坚尚未出生，其父“为县使越巂，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禽坚长大后“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多时间，“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10]官吏将士的进入，成为了移民身份转换的一重要途径。

汉代的外来移民中还有屯田农民。《史记·平准书》载：“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官员士卒及修路民夫所需粮用浩大，巴蜀难以供给，只好招募内地商人富豪出资到西南屯田，将所收谷物上交当地官府，再到内地府库领取粮款。而具体从事屯田垦殖者，则是应募而来的大量内地农民。这是云贵地区屯田制的开端，也是古代西南地区最早的移民屯田。

此外还有官府强迫迁来的各种罪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言汉开益州郡治滇池，地广人稀，“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置不韦县时，“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三国志·蜀志·吕凯传》裴注引东晋孙盛《蜀世谱》则云：“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此虽记载不一，但不韦县的设置和得名与外来移民相关却明白无误，也说明了当时迁入的罪人来源广泛和数量之多。1978 年，贵州威宁县中水区中和乡梨园村汉墓出土随葬品铜制“张光私印”一件、五铢钱一枚；经学者考证，墓主张光即为西汉元帝时曾参与宫廷斗争失败后的被流放之人。^[11]1987 年在云南保山龙王塘一房屋基址中出土一批板瓦、滴水、瓦当、砖、铁钉等，砖侧有各种花纹及“五铢”、“五王”、“中平四年吉”字样，^[12]而“中平”则是中国历史上东汉灵帝时唯一用过的年号，中平四年即公元 187 年。这说明汉武帝以后，汉代不同类型的移民仍在以各种方式进入云贵地区。

二

秦汉时进入西南夷地区的外来移民。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促使人口迅速增长，提高了当地社会生产力。

古代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各地人口数量的多少及分布密度的高低，成为人们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此时西南夷地区的移民数量史无明载，但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及东汉顺帝永和 5 年（公元 140 年）有关部分人口资料的研究和前后对比中，仍可窥其大概。云南，西汉时今境内的人口总数估计为 100~120 万人，东汉时约 200~220 万人，增加一倍左右。^[13]今云贵境内牂柯郡，西汉时下辖 17 县 153360 人，东汉时下辖 16 县 267253 人，^[14]增加 74%。特别是东汉所设永昌郡，辖地广阔，人口达 189 万余，在全国 105 个郡国中仅次于南阳郡（243 万）、汝南郡（210 万）而位居第三，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第一大郡。人口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官府对当地民族人口控制的加强而使编户扩大，也说明了外地移民户口的不断增多。据研究，永昌郡众多的人口，当地土著民族内附而有记载者

不到一半,其余很多则来自封建王朝有组织的外地迁徙,西汉武帝时讨平南越后迁往不韦县的南越相吕嘉遗族即占了相当部分。^[15]在地广人稀、社会发展程度低下的西南夷地区,内地移民的迁入加快了当地人口增长的步伐,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和社会生产力,增加官府의 纳税对象,扩大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两汉时的史料中常见区分汉人与当地民族的“郡兵”、“郡民”及“夷汉”、“民夷”、“夷民”、“吏民”、“夷夏”之类记载,说明外来移民已有相当数量,并在当地的民族构成及社会活动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第二,支持郡县设置,奠定了现代中国西南版图的基础。

西南夷所居地域广阔,部族部落林立,社会发展差别很大。秦朝立国日短,未及在该地进行全面有效的统治。两汉王朝因地制宜,采取灵活变通的政策,在势力所及地区,实行了既适应内地封建地主经济,又相容于当地奴隶制、原始社会经济的双轨统治方式,各地建立郡县的同时,在坚持当地民族对中央王朝隶属关系的前提下,保留了若干降附中央的土著首领,承认其原有的地位和权力,封其为王、侯、邑长,如夜郎王、滇王、句町王、漏卧侯之类,“以其故俗治”,^[16]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汉武帝时所置益州郡领属24县,全在今云南境内,其中不韦、嵩唐、比苏三县既是益州郡西部的边界,也是西汉王朝在这一地区的西部边界,相当于今怒江上游以东的泸水、云龙、保山县的北部和东北部、永平县的北部一带;其南部来唯县与交趾郡相连,包括了今越南北部莱州的部分地区,亦成为当时中国西南部的边境县之一。东汉永昌郡的设置意义尤其重大,其地与今缅甸、老挝相接,西南部疆域基本形成,由此奠定了现代中国西南版图的基础。而郡县与羁縻双轨制的存在,则离不开外来移民的广泛支持:外籍官员构成了郡县机构的政治核心,各地郡兵承担着安定社会、稳固统治的军事任务,其他移民则在屯田纳粮、维护交通、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与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共同支持着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及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直接和间接统治。

第三,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铁器和冶铁技术的引进。云南矿产资源丰富,其地青铜器的产生和使用,促成了秦汉时本土滇文化的发展和辉煌;而铁器的出现,则体现了外来文化的重大影响。西汉中期以前,西南北部的蜀郡已成为整个地区的冶铁中心,而南部西南夷一带的铁器,其使用和推广则主要依赖于外地移民的传入。史载战国末年,“用铁冶富”的赵人卓氏国亡后被迁蜀地,“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同样迁至临邛的山东人程郑,“亦冶铁,贾椎髻之民”。^[17]此言“倾滇蜀之民”、“贾椎髻之民”,说明临邛铁器的相当部分,通过移民之手和商道流向了少数民族集中的滇黔地区。西汉中期以后,边疆与内地交往频繁,滇黔地区铁器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近几十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呈贡、丽江、昭通,贵州赫章可乐、清镇、平坝等地发掘出大量文物,除大批青铜器外,其中还有不少西汉中期至东汉时期的铁农具铁镬、铁锄、铁斧、铁镰、铁铧及其他用品,有的农具上即铸有“蜀郡”、“成都”之类铭文,表明此时滇黔地区铁器的使用已很普遍,有的为当地制造,有的系由巴蜀输入。而这些地区,正是当时外来移民较为集中和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

其次,是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铁农具的制作和使用,大大促进了西南地区水利工程的兴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的官员还创造条件,结合内地先进的耕作方法,对当地民族劝课农桑等。如西汉末广汉梓潼人文齐为属国都尉,在犍为郡南部今云南昭通地区“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任益州太守,于滇池一带“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7]不少地区在兴建水利的基础上,以高产的水稻栽培取代了旱地作物。^[18]近年云南呈贡、贵州兴义等地出土的东汉时期陶质池塘和水田模型,均与巴蜀出土的汉代水田模型相似;而云南昭通东汉墓葬则出土了当地民族牵牛耕田的画像砖,^[19]说明耕牛在云南历史上

的使用，至少不晚于此时期。

在外来移民和当地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一些地区发展很快，其兴盛繁荣程度并不亚于内地，如滇池地区即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伙，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的记载。^[3]这表明，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正通过移民源源不断传入，对改变当地落后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四，传播封建文化，增强了当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

汉武帝以前，西南夷部落多“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3]其后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统治势力的深入，内地封建文化也在各地广泛传播，并为当地民族所认同和吸收。有的官员在自己辖区内建立学校，为直接推广儒家思想和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如东汉章帝时，治理当地“政化尤异”的益州太守蜀郡人王追，在滇池地区“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3]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地区的风俗习尚发生变化而不断接近内地。如汉晋时的朱提地区，“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犍为郡“士多仁孝，女性贞专”；^[7]越嶲地区，“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20]有的移民后裔主动到中原发达地区拜师求学，积极推动家乡文化的发展。如东汉恒帝时，牂柯郡“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最后并官至荆州刺史，^[3]成为了今贵州地区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和最早仕宦内地的高级别官员。1901年云南昭通发现的《孟孝琚碑》，记载东汉中期朱提人孟孝琚，12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21]朱提多移民大姓，孟氏即其中之一。孟孝琚自小学习儒学，婚前先聘，死于外地而由族人归葬祖塋，碑文中并称“孔子大圣”等，表明孟氏家族十分熟悉儒家文化并在婚丧方面遵循内地习俗，也由此证明了两汉时中原封建文化在西南地区的流行及其与外来移民的密切联系。

有的地方官员则能较处理好官府与治下民众的关系，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在个人操守上作出表率，增强了当地民族对中央王朝的好感和向心力。如东汉明帝时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被任为永昌太守；治理永昌也一如既往，“夷俗安之”，最后卒于任上。^[3]同时期益州刺史梁国（今河南商丘）人朱辅，“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吸引了今川西、滇北地区“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的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130余万户、600余万人，“举种奉贡，称为臣仆”；其中白狼王为表“慕化归义”之心而作诗三章（后人称为《白狼歌诗》），“襁负老幼，若归慈母”，穿越崎岖险峻的邛来大山转献于朝，^[3]留下了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五，形成大姓势力，主导了后来西南局势变化的走向。

大姓，即世家大族，为魏晋南北朝时兴起的特殊社会阶层。大姓世代相袭，与地方官府关系密切，政治经济实力雄厚，领有部曲即掌握一定的私人武装。汉晋时期，今川南及滇黔地区又称南中。南中各重要地区都分布有大姓，如滇东建宁郡有焦、雍、娄、爨、孟、量、毛、李氏，滇东北朱提郡有朱、鲁、雷、兴、仇、递、高、李氏，滇西永昌郡有陈、赵、谢、杨氏，贵州牂柯郡有龙、傅、尹、董、王氏等。^[7]当地民族中也有雄据一方的豪强集团，但多称夷王、夷帅、叟帅，如“越嶲叟大帅高定元”之类；大姓则不同，主要由外地移民发展而来。自西汉中期外地移民陆续进入西南地区后，内地盛行的宗族制度也随之传入。汉末魏晋时，一些移民上层特别是那些“富及累世”的官员后裔逐步演化为当地的豪族大姓，并对南中地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著名者如：

雍闿，其祖雍齿与汉高祖刘邦同为楚地江苏沛县人，与刘同时起兵，楚汉战争中有怨离去，后又归返，刘邦称帝后为示胸怀宽大，将其封到四川什邡为侯；汉武帝时雍氏后人被剥夺爵位并大致于此时谪迁入滇，至东汉末雍闿“恩信著于南土”，^[22]成为南中著名大姓之一。

三国相争时，雍闿意图割据，继受吴国拉拢，假借“鬼教”煽动当地夷帅反蜀、杀蜀所署太守等，使蜀国后方烽烟四起，成为了诸葛亮出兵南中的直接导因。

霍氏，楚人移民后裔。《三国志·蜀书·霍峻传》及《华阳国志·南中志》等载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人霍峻，其子霍弋先后领永昌、建宁太守；弋卒，子袭职、领其兵。霍弋孙霍彪继承祖业，东晋时亦官越嶲、建宁太守。1963年在云南昭通后海子发现东晋太元时壁画墓，据墓内题记，墓主霍承嗣，南郡枝江人，历官南中交、宁二州都督及刺史，建宁、越嶲、兴古三郡太守及南夷校尉，死时先葬蜀地，后改葬朱提，壁画中墓主周围并有“夷汉部曲”形象等。有学者根据文献资料与壁画内容，断定墓主霍承嗣即霍峻之孙霍彪。^[23]霍氏历居南中高官，拥有家兵部曲，势盛于南中，一度与爨氏争强，后落败崩溃，形成了爨氏独霸南中的局面。

爨氏，势力最为显赫。在云南历史上，继战国秦汉的青铜文化之后，有东晋至隋唐时的爨文化和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文化，三者构成了云南民族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和重要环节，而创造了爨文化的主体之一即入滇楚人后裔爨氏家族。据清道光时发现于今云南陆良县薛官堡的南朝刘宋时《爨龙颜碑》所载，碑主爨龙颜为宋文帝时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其先祖为“少昊、颛顼之玄胄”，楚国令尹子文及汉代班彪、班固的后代，汉末时“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后迁于南中，任晋宁、建宁二郡太守及宁州刺史等职。爨氏世代相袭，在中原内乱之时成为南中地区事实上的最高长官；梁陈之际爨璜时势力鼎盛，后人“闭门天子，开门节度”之说。^[24]迨至唐中叶被南诏地方政权取代为止，爨氏在南中地区割据称雄，历时三、四百年之久。

另外，还有“感恩内著，为郡中所信”的南越王相吕嘉后人永昌郡太守吕凯，^[25]以及建宁郡的孟获、李恢，朱提郡的朱褒等，均为南中大姓中的风云人物，在蜀、吴两国控制争夺南中的局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诸葛亮治理南中，采取“不留外人、不留兵”的政策，^[26]其所依靠的力量，主要就是当地拥蜀的大姓势力。

三

秦汉时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在来源和走向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即迁巴蜀者多为中原各地移民，迁滇黔者则多来自巴蜀地区，或经巴蜀而入滇黔。如前所述，秦始皇以大量六国贵族等充实巴蜀，而从常璆通五尺道、置吏开始直至两汉，进入滇黔的各类移民也多来自巴蜀。此特点的出现，与当时西南地区的总体状况及中央王朝以巴蜀之力开发西南夷地区的治理方略分不开。

西南北部的巴蜀地区，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基础雄厚，战国后一直发展很快，特别是蜀地自郡守李冰开凿都江堰后，“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天下谓之‘天府’”，^[1]至西汉前中期时已成为全国繁荣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而南部边外的西南夷地区，则尚多处于部落“以什数”、“君长以什数”，“毋常处，毋君长”、“或土著，或移徙”的原始落后状态。^[2]汉武帝为打通南向通道而始开西南夷，由北向南步步推进，作为相邻前沿的巴蜀地区，自然成为了承担需求重任的首选战略基地。

《史记·平准书》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初郡十七，据南朝裴骃《集解》，指南方初次所置之郡，其中南越九，西南夷八；西南夷八郡，为益州、犍为、越嶲、牂柯、沈犁、汶山、武都、零陵（后因沈犁、汶山二郡撤消，武都位居甘肃，零陵居广西、湖南，故西南实为四郡）。各以地比，唐司马贞《索隐》释其义，谓“各以其地比近

给初郡”；《汉书·食货志下》唐师古注云：“地比，谓依其次第自近及远也。”即汉武帝时形成制度，在西南所置“初郡”地区，除军事行动中的兵力调配及相关军费开支主要由中央承担外，当地从开发、稳定到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基本由邻近的巴蜀数郡提供，分摊负责。

据研究，两汉时在西南相对稳定的巴、蜀、广汉、犍为、越巂、牂柯、益州、永昌八郡各地任职的太守，其籍贯来源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北部四川盆地盆中、盆西蜀、广汉二郡可考籍贯郡守 31 人，本土籍人士仅 3 人，其余 28 人全来自北方中原；盆东巴郡可考籍贯郡守 21 人（次），其中北方中原籍贯 10 人（次），西南籍贯 11 人（次），各占一半。中部今川滇黔交界处的犍为、越巂二郡可考籍贯郡守 13 人（次），来自北方中原者锐减为 4 人，其余 9 人中 1 人为本地籍、8 人为北部巴蜀人士。南部今滇黔地区的益州、永昌、牂柯三郡太守 12 人（次），除 1 人为原属巴蜀地区的汉中籍外，其余全为巴蜀籍人士。^[27]这一用人状况，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两汉统治者在西南开发中“各以地比”、北人治南、分区推进政策的鲜明特征。

与此类似，西南地区的移民在形式上也呈现出由北向南、分区推进的特点。如果说，战国时秦惠文王灭蜀国置巴郡而“移秦民万家实之”为北方移民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巴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六国贵族、富豪等迁入巴蜀是北方居民南迁巴蜀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28]那么，汉武帝时大量巴蜀移民进入滇黔地区，则可称之为北方移民经过巴蜀本土化的培育和转化后，向南方边域进行的一次三级跳式的大进军；而此时，由滇黔东向经湖南达中原的道路尚未开通，内地人员物资唯取五尺道、南夷道等方能抵西南夷地区。因而，滇黔地区移民多来自巴蜀或经巴蜀地区而入，也就势所必然，不足为奇。

历代统治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拓治理，可说是军事、政治、移民三步曲——首先以军事手段进行征服控制，随后建立相关行政机构，继而安置各类移民以巩固其基础。移民地区范围，随着内地影响的增强和时间的推移而由北向南、从内到外逐步扩大，如同投石入水后的波纹，一圈一圈外推伸延。秦汉以来移民运动的轨迹，也就是西南边疆疆域不断扩大、发展和巩固的历程，移民成为了封建王朝进行疆域扩展和改变人口分布状况的重要措施和有效手段。此时期中，全国移民较多者有巴蜀、岭南、防御匈奴的北方及迁徙豪强集中的都城咸阳、长安等地；西南边疆于部分地区设置官吏、驻军戍守、移民屯田、安置谪民等，尽管总体数量上并不太多且主要分布于郡县治地及交通沿线，但他们成为了中原王朝在边疆实施统治的核心和基本力量——每当某些土著王侯兴兵反抗时，汉王朝总是依靠移民并联合其他忠于朝廷的当地力量把反抗镇压下去——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支持和帮助，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羁縻”政策势难顺利推行。正是在移民的努力下，才使中央王朝的政治势力首次进入滇黔腹地后，在边疆与内地相互一体的基础上保持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上通下达，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了解和控制，并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统治和稳定。

此时期外地移民的进入，对促进西南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边疆得到开发、巩固的同时，内地的思想文化及生产、生活方式也移植到新开拓地区；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混居杂处，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影响和交流，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条件。移民与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西南大部分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国家疆域得以稳定并逐步扩大，由此正式打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西南归属于中央王朝的大门，为后世历代对该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统一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外地移民的进入也有消极的一面，大量移民的迁徙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加重了内地人民的负担和迁民的痛苦，而迁入之地在打破封闭隔阂的同时，长期的宁静平衡也遭破坏；特别是封建王朝开发边疆的目的并非为当地人民着想，而是为了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

围和扩大疆域版图，以从中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因而，血与火的洗礼往往是各地开发和移民前的先锋，而当国家政治腐败严重侵害当地民族利益时，也往往加剧社会矛盾而引发动乱。如东汉安帝时，“郡县赋敛烦数”，永昌、益州及蜀郡夷叛，众达十余万，“杀长吏，燔烧邑郭”；益州刺史张乔派从事杨竦率兵至叶榆击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3]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然而，此类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史上，却又难于避免。

参考文献

- [1] 常璩. 华阳国志 [M]. 卷 3 蜀志.
- [2] 司马迁. 史记 [M]. 卷 116 西南夷列传.
- [3] 后汉书 [M]. 卷 86 西南夷列传.
- [4] 汉书 [M]. 卷 43
- [5] 司马迁. 史记 [M]. 卷 117 司马相如列传.
- [6] 水经注 [M] 卷 33
- [7] 常璩. 华阳国志 [M]. 卷 4 南中志.
- [8] 司马迁. 史记 [M]. 卷 113 南越列传.
- [9] 汉书 [M]. 卷 95 西南夷传.
- [10] 常璩. 华阳国志 [M]. 卷 10.
- [11] 何凤桐. 张光徙边丛考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0, (4).
- [12] 汪宁生. 云南考古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13] 李寿, 苏培明. 云南历史人文地理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6.
- [14] 后汉书 [M]. 志第 23 郡国五.
- [15] 杨兆荣. 西汉南越王相吕嘉遗族入滇及其历史影响试探 [J]. 中国史研究, 2004, (4).
- [16] 司马迁. 史记 [M]. 卷 30 平准书.
- [17] 司马迁. 史记 [M]. 卷 129 货殖列传.
- [18] 沈仲常. 东汉石刻水塘水田象略说 [J]. 农业考古, 1981, (2).
- [19] 李昆声. 云南耕牛的起源 [J]. 考古, 1980, (3).
- [20] 王充. 论衡 [M]. 卷 19 恢国篇.
- [21]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M]. 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22] 三国志 [M]. 卷 41 蜀书·张裔传.
- [23]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演示文稿 [J]. 文物, 1963, (12).
- [24] 新纂云南通志 [M]. 卷 84 金石考四. 1948 年铅印本.

【25】三国志[M].卷43

【26】三国志[M].卷35

【27】黎小龙.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6).

【28】黎小龙,徐难于.论秦汉时期西南区域开发的差异与格局[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

A Discussion on Immigrants in Southwest Areas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s well as Its Role on Developing Borderland and Its Moving Characteristic

GU Yongji

(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 Borderland's Ethnic Minorit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During hundreds year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southwest area entered an important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Immigran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borderland development, area form and local situation changes. On the basic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immigrant which entered southwest area by all kinds of ways. And it also discusses the role of immigrant in proving local population growth, supporting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establishment, int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disseminating feudalism culture, forming the common surname power. Moreov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ving characteristic of immigrant at that time in southwest areas.

Key word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southwest areas, immigrant, developing borderland, characteristic.

收稿日期: 2005-06-02

作者简介: 古永继(1953-),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冰贝)